

中国边疆考古的新视野： 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综述

杨 锋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2005年11月7日,“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共同举办,旨在进一步推进边疆考古学纵深发展,促进边疆考古学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会议收到论文及论文提要50余篇,来自我国及我国香港地区高校、省市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近50余家学术机构的120名代表出席会议。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徐荣旋,以及四川大学副校长陈爱民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主持开幕式,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致开幕词。会议分七场次,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研讨,研讨主题涉及吐蕃与丝绸之路、北方边疆考古、西南地区民族与考古、边疆地区古代人种及分子考古学、边疆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等。

一、吐蕃与丝绸之路考古

公元7世纪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对内陆亚洲的历史影响深,但长期以来,吐蕃的历史叙述多是零碎的、片断的连缀。得益于近年来吐蕃时期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吐蕃在中古时期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尤其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逐渐凸现。本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著名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做了题为《“钵阐布”考论》的演讲,依据汉藏文史料对吐蕃的“钵阐布”这一官职的藏文对译、“钵阐布”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讨论。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杨铭教授对出土于新疆安得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23件古藏文写本进行了介绍和考释,并对写本的年代、当时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历史信息作了分析。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从岩画、佛教艺术等考古材料的比较分析入手,结合文献对塔里木盆地与西藏西部地区文化交流作了勾勒,认为吐蕃时期在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与西藏西部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西藏西部很可能承担着中亚与敦煌、卫藏地区文化传播的中介角色。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汤惠生教授介绍了青海玉树2勒巴沟地点发现的吐蕃初期的佛教摩崖,认为摩崖内容包括大日如来及其两弟子、佛塔、飞天、金刚力士等,根据图像制作方法及其风

格，其年代应介于地点1和文成公主庙之间。四川大学考古系李永宪副教授依据考古、文献、民族学材料中有关吐蕃“赫面”习俗进行了讨论，认为考古材料中青海都兰吐蕃墓木板画、德令哈果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所见的“赫面”样式，是这种面饰的具体再现，其起源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中寻绎线索。另外亦有学者论及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的一些问题。如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维坤教授对近几年在西安北郊所发现的北周时期粟特人及罽宾国人墓葬做了分析，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等方面论证了其“汉化”过程；四川大考古学系博士生李瑞哲提交的《丝绸之路上粟特人商业活动蠡测》，对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踪迹、商业活动特点及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做了阐述。

吐蕃墓葬的调查和发掘一直是西藏考古中重点和热点，而高等级墓葬考古在吐蕃政治、文化史研究中极为关键，近年来陆续披露的青海都兰墓葬、拉萨河谷的柳吾墓葬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带来新的刺激。本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西藏高原已发现的包括藏王墓在内的高等级墓葬进行了广泛讨论。北京大学考古系齐东方教授介绍了青海省都兰县血渭草场热水沟南岸的四座吐蕃墓葬的考古发掘情况，这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8世纪中晚期，墓主人应是吐蕃贵族墓葬，齐教授认为这批墓葬对了解吐蕃人的丧葬习俗、信仰以及与中原、中亚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著名藏学家、西藏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教授结合考古材料和藏文文献对朗县列山墓地的年代、墓主身份做了考证，认为其与吐蕃时期的“钦”家族有关，并以此为例提出了关于吐蕃“非王室墓葬”的研究方法的几点意见，获得了与会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介绍了琼结藏王陵的调查勘测成果，现代化的探测手段和图像技术提供了关于墓地布局新认识，王教授依此结果比照文献对东陵区与西陵区墓主与吐蕃王系的比定提出了意见。上述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结合汉藏文献，认真分析并尊重科学考古资料是研究吐蕃高等级墓葬的不二法门。

另多位学者介绍了近年西藏高原的一系列考古新发现。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李林辉介绍了近年来西藏开展的考古工作及收获，如萨迦寺抢救性考古清理项目中萨迦南寺羊马城城墙及护城河壕沟的发掘清理、萨迦北寺得确颇章遗址的发掘、林芝地区波密地区考古调查、青藏铁路调查中当雄县羊八井镇加日塘遗址发掘、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的成果。其中加日塘遗址为青藏高原首次发掘的以细石器遗存为主体的游牧文化遗存，年代明确，为今后同类遗存的研究树立了参考范例。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建林研究员介绍了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藏考古研究室在阿里地区进行考古调查的情况，其中在藏北高原所发现的列石遗迹，罗布措湖环湖分布的岩画地点等极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慧民副研究员介绍了在2005年藏东丛林的考古调查成果，展示讨论了新发现的波密卡达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元代波密县噶朗建筑遗址、米林县建筑遗址，为藏东古代文化探索提供了新资料。

二、中国北方边疆考古新进展

广阔的中国北方边疆是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农牧交错带”，是古代文化熔炉和古代民族熔炉，其族群迁徙和经济文化的变迁造成的边界变动对中国边

疆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而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对于理解五千年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极为关键。这次会议上,多位学者对这一地区考古近年来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研讨交流。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学堂研究员依据新疆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围绕着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对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进行了讨论,认为新疆早期青铜文化的发生与中部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存在的渊源关系,青铜器在公元前三千纪随原始印欧人的东传进入中国西北并持续东传至二里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朱永刚教授、王立新教授介绍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调查研究,构建起了这一区域的编年与谱系,并认为林西井沟子墓地所代表的“井沟子类型”是迄今发现的最有可能为东胡族的考古遗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索秀芬研究员等对牛河梁遗址的演变过程、红山文化的分期等问题做了分析。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杨建华教授等从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演变对晋陕高原龙山晚期到商代文化格局的变化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做了重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许永杰教授基于河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势力消长,对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移民浪潮做了概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魏坚教授介绍了1998年至2002年居延考古的新进展如绿城子遗址、汉代烽燧障塞、西夏红庙佛教遗址的调查发掘,并对额济纳汉简出进行了讨论。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介绍了近年西北大学在对西北草原地区开展的游牧文化考古调查成果,并对包括岩画、居址、墓葬在内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王乐文博士提交的《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墓葬》通过对墓葬因素的统计分析,探讨了朱开沟甲类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分层情况。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田广林教授提交的《考古所见契丹时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对考古发现中的契丹与辽朝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材料进行了考释。中央美术学院张鹏博士提交的《互动交流中的辽代皇室审美趣味与艺术成就》通过对辽代文献及近年考古资料的梳理,对辽代皇室五仪中的艺术活动、辽代皇室成员的艺术实践和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等相关问题作了廓清。

三、西南地区考古新进展

西南地区考古学近年来新发现层出不穷,不断刷新既往对中国古代文化总体格局的认识,西南地区考古新发现的展示和研讨亦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之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教授介绍了最近在川西北康巴地区调查发现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等佛教遗存;凉山州博物馆刘泓研究员向与会者介绍了近年来在盐源盆地发现的一批别具特色的青铜器,对于西南青铜时代的文化因素及民族移动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成都博物院江章华研究员介绍了最近在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试掘成果如大兴横栏山、咪咪啷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认为诸多发现显示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远非“元谋大墩子—礼州类型”所能概括,对这一区域新石器文化面貌提出新的意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副研究员介绍了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的发掘成果,提出了“鸡公山文化”命名的可行性,并对这一文化在黔西北至滇东北的分布情况作了讨论;四川大学考古系宋治民教授结合金沙遗址出土的尖底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对新发现的金沙遗址的年代提出讨论,认

为金沙遗址的繁荣期大体在春秋后期，上限可到西周时期；四川大学考古系林向教授对成都平原蜀文化考古中的若干巴蜀“文化标志”图像作了新颖独到的解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明华研究员以考古出土实物材料，概括了滇青铜文化的特点以及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在云南的扩散过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井中伟博士提交的《巴渝地区出土的青铜戈及其相关问题》对川渝地区铜戈的类型划分、分期与年代、渊源与演变、分布与族属及相关问题作了考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韦江副研究员提交论文介绍了广西考古新发现，并对广西在中国边疆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论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研究员提交的《天子庙贝丘遗址：云南发掘的第一个滇文化遗址》介绍了2005年发掘的天子庙贝丘遗址的概况，认为其年代与滇文化重合，是目前唯一的滇文化居住遗址，对于滇文化的研究及其重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帆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百濮考》、《滇名称的由来》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比定出发对云南青铜时代文化的族属作了考证，认为春秋中后期至战国、西汉时，在以滇、黔及桂西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开始出现使用铜鼓的、椎髻衣着尾的众多民族属于“百濮”而非通常认为的“百越”，而滇之得名并非因为“滇池”而与“氐”有关；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宾福教授提交的《从中坝和大溪看老关庙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一文，依据近年三峡考古资料对老关庙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做了分析，认为其应处在仰韶时代的中晚期，最迟当不晚于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生王苏琦提交的论文对海外藏几件西王母题材汉代艺术品做了介绍，为四川汉代艺术与信仰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四、分子考古学与北方边疆古代人种

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是21世纪国际考古学科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今后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的一项重要标志。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当代中国考古学中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展。作为本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学者向与会者展示了这一新技术在中国北方边疆考古实践中所取得丰硕成绩，显示了这一分析技术在中国考古中的深厚潜力。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朱泓教授根据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资料所提供的线索，对考古发现的鲜卑、契丹等人骨资料综合分析，提出了“东胡”的人种类型当属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并认为新发现的井沟子墓地的人骨代表中国东北地区年代最早的一批西伯利亚类型的居民极可能就是东胡人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蔡大伟博士等从二里头遗址的古绵羊骨骼中成功地提取的古DNA线粒体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二里头古绵羊属于亚洲谱系，与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在遗传上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与西北的野生盘羊关系疏远。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李法军博士对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居民骨骼做了系统、详细观察，提出了若干古病理学现象，并探讨其产生的原因，为探索新石器时代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和健康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付玉芹博士等对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得到10个完整的古代个体的线粒体DNA序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古人与现今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和鄂温克斯人以及蒙古人

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从而认为新店子墓地古人在战国早期或以前就从西伯利亚南下迁移到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靓博士通过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秦墓出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以及先秦时期甘肃礼县和春秋时期陕西凤翔秦人食谱的研究的可能性和前景做了论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动物学系博物馆馆长苏拉提萨与吉林大学汤卓炜副教授通过对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动物组合的分析,重建了这一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魏晋时期生态面貌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些对传统考古学来说颇为陌生的研究领域,为考古学上许多重大问题如族属、古代生活方式的重建带来新的契机,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

五、周邻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边疆地区处在文明交汇的前沿,对境外考古材料了解熟悉程度直接关系到边疆考古研究的学术深度。长期以来,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方面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这次会议上多位学者的研讨主题都直接涉及境外考古材料,显示了中国边疆考古在新世纪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实力。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培新教授对西北朝鲜地区木椁墓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年代源流等做了分析,认为木椁墓兴起与自战国晚期以来大批中国内地居民的移居不断增强有关,初始年代应在乐浪郡设立之后,墓主人身份为乐浪郡汉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潘玲博士对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做了讨论,根据鹿石上具有年代特征的北方系青铜器,对蒙古及周边的鹿石的年代进行了讨论,认为鹿石的发展变化与北方系青铜器有基本一致的对应关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塔拉研究员、陈永志研究员介绍了近年蒙古国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考古研究情况以及2005年内蒙古考古所等与蒙古国国立历史博物馆在蒙古国中东部地区调查发掘所取的丰硕成果,这是我国考古研究人员首次进入这一地区考古,对蒙古高原古代游牧文化的研究意义深远。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冯恩学教授提交论文对200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合作,在对俄罗斯阿穆尔州特罗伊茨基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情况做了介绍,这是中国高校考古专业师生首次在境外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实习。上述研究对于中国边疆考古学如何立足边疆、跨越边疆及中国考古学如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范例。

六、边疆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边疆考古学如何定位?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的关系如何?如何整合民族、考古资料?这些问题都关涉边疆考古学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水平。本次讨论会上,多位学者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郑君雷副教授以汉末魏晋河套阴山地区的北方民族遗存的族属研究为个案,探讨了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与当代人类学中族群概念的整合问题。云南大学李东红副教授反思了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认为在中国边疆考古中,既要提倡“民族史的考古学”,也要重视“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提交的《边疆考古与民族考古学》一文回顾了民族考古学在中

国的实践及存在的分歧，对民族考古、民族考古学、边疆民族考古等概念作了辩证厘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力楠副教授提交论文《边疆考古与历史学、民族学的关系——以东北考古为例》，介绍了整合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在东北的实践。

这次会议集中了诸多活跃于边疆考古一线的学者，对中国的内陆及沿海疆域考古展开广泛研讨，展示新材料，争鸣新观点，集中显示了近年边疆考古取得丰硕成绩，对于进一步打破地域界线和学科藩篱，加强学术协作交流，以全新的视野探究广阔中国边疆地区乃至内陆亚洲的古代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拉铁摩尔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所指出的：“草原的游牧社会及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可能在中国及亚洲内陆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两个主要社会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以考古实物遗存研究为根基的中国边疆考古学，势必为这样一个充满“阻隔”与“连续”的过渡地带的历史重构带来新的契机。可以预见，一幅跌宕起伏的“中心”与“边陲”文明互动的历史画卷，将在中国边疆考古学者的努力下，线条日趋丰富，并日益接近历史真实。首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便反映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可望开拓出 21 世纪中国边疆考古的新格局与新领域。